



## 凡尘晓遇

专栏

## 田园

□李晓

从北京回到故乡城市的一个友人，在一家馆子里请了当年一些文友聚会。席间他问起文友们的情况，得知大多数人已经远离写作了，只有我还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他又问我，你写了啥满意的作品？我一时吞吞吐吐。

后来我告诉他，我差不多还是在报纸副刊写一点东西，确实没啥拿得出手的东西，也加入了故乡城市的作协。他勉励我，继续干你喜欢的事情吧。他说，自己血脂、血压高，满身中年人的油腻，也远离了写作，文字只是过去岁月里的一股清流了。

前不久，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退休了，他第一次约我到他家里吃饭。老编辑自己做了几样菜，很是郑重地招待我。

老编辑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耕耘在副刊这块田园上，我是那块田园上的“老庄稼人”，准确地说，他是我文字的园丁。老编辑与我喝得微醺，与他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望着城里的灯火陷入了沉默。走出他家门时，老编辑拉住我的手说，今后，你也别叫我老师了，我也没机会给你编发文字了。我张开手，用力地抱住了他，喊他：“你还是我的老师，我记得的，是您的鼓励，让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我看见这个平时显得木讷的老编辑，眼里有了泪光。

这些年，我在报纸副刊这块田园上，收获着文字酸酸甜甜的果实。对报纸副刊这块老兵一样坚守的阵地，充满了敬意与感恩。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背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常在屋后喊：“报纸，报纸来了！”那是生产队里订订的一份报纸。当年报纸上的消息对一个离城市数百公里的偏僻山乡来说，俨如“圣旨”般神圣。

那时我常在家乡报纸上读到“本报记者周某某报道”的消息。我在县城读高一，步行去这家报社投过稿，甚至想去找一找那位老乡记者帮我在这家报纸副刊上把那首诗歌发表出来，不过最终还是怯于面子，没去找老乡记者托关系发表，我想凭自己的努力发表作品。

那年我16岁，唇边的小胡子已如玉米吐须一样冒出，文学梦业已萌芽却羞于见人。那一年是1985年，报纸、电视、收音机，是最重要的媒体硬件。没想到，此后经年，我与报纸副刊竟结下了不了情。

最初的那些年，我的投稿还是通过邮局，想象着邮车穿过崇山峻岭，一道一道弯，车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有古代驿路上马车哒哒行驶的感觉。从邮局投稿，我就掐指算着它抵达编辑案头的时间。那时报纸编辑也还是用纸笔编版。所以每一篇文章的见报，都带着匠人的手艺与手温。

这些年来，我在文字田园里的耕耘，于灵魂深处的寂寞碾磨，让我的很多文字在各地报纸副刊版面上得以呈现。30多年里，山河故人依稀，我迎来了中年的凛冽天风，幻觉中有风雪漫漫，其实也有恼人的头屑飘飘，我的发际线如同城市的天际线一样，在拔地而起的幢幢高楼中一天天在抬高。30多年里，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文章算起来也可出好几本集子了。可以说，从我在报纸副刊发表的文字当中，可以大致窥探一下我这些年隐秘的“心电图”。

在世俗的生活里，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常常被小情绪左右捆绑，不善与人打交道，有时内心翻滚却拙于言辞，生怕突然的一句话让我跑了体内元气。不过在文字里，我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我靠这个来疏导情绪，求得更深地理解生活，同时也与自己的情绪达成短暂的和解。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赖，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说，写作好比怀孕，你没写出来时，它拖拽着你的身体，只有把它鼓起勇气生下来。依赖于写作，这其实也是一种鸡汤灌注的私人生活。尽管我时时感到，我的一些文字表达与真实的微妙的起伏多变的情绪情感有一些脱节与变形，但正因为如此，文字的涓涓流向由此宽大了情感的出口。

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大多只是一种神交。我了解的一些副刊编辑，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工作时光，把青春与芳华，都献给了副刊。我故乡城市的两家报纸，先后为我开办个人专栏，编辑与我，至今尚未谋面。想一想这些，心头备受鼓舞，也有陪伴的温暖。

我认识的一些副刊作者，他们大多和我一样，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欣，望一眼世间万物生长又凋谢，在烟火腾腾油腻粗糙的生活中，寻觅一方让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他们和我一样，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阵地，让我们在那里播种，收获；他们和我一样，或许一辈子就写一点副刊文章，成不了大作家大气候，在去去来来迅速化为纸浆的新闻纸中昙花一现。但我们已感到很欣慰了，像一辈子靠种地为生的老农一样，我们有一方田园的坚守。

在这个碎片化浏览占领大多数人阅读习惯的网络时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随之凋零了。但我想，作为一张新闻纸，新闻版面是招徕读者的客厅，而它的副刊，是腾着袅袅香气的私家厨房。在那样的厨房里，有亲人们等你风尘仆仆归来后，在灯火下吃上一口地道家常饭菜。

感谢副刊田园，让写作者的文字，郁郁葱葱生长，也让命运的烟云，飘荡到更辽阔的世界。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 揪心的生日

□刘冲

生日，是一个人降临世间的时刻，是人生旅途的起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隆重纪念，热烈祝贺，理所当然。

特别是在我的老家，许多人对过生日尤为看重，胜过了诸多节日。每逢生日，都要邀请亲朋好友欢聚。

我却不喜欢过生日，甚至拒绝过生日。

平常的“散生”，过不过还无所谓，而每逢进十的生日，父母、弟弟妹妹以及岳父岳母家都要反复多次地表示要来为我庆生，我也要反复多次地婉拒推辞。有一回岳母生气了：“你啥时候才能过一次生日？”“60岁吧，等我退休的时候。”没有想到的是，在我尚未到50岁，岳母就因病去世了，为此妻子无数次地抱怨：“你也太狠心了嘛，我妈想给你过一次生日的心愿都不能满足她！”

不愿过生日，直接的原因是怕麻烦，既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在请谁不请谁的取舍中纠结；也不愿给亲友们添麻烦，在来与不来的抉择中烦恼。更深层次的症结，是曾经过的几次揪心的生日，在内心深处留下了怕过生日的后遗症。

唱生日歌、吹蜡烛、切蛋糕、吃生日宴，是现今小孩庆生的基本配置，若能穿越，会被我们那一代人视为天方夜谭。小时候过生日，想借此打一回牙祭，也属痴心妄想，能吃一个煮鸡蛋差不多就是最高待遇了。家中兄弟姊妹多，有谁过生日了，不可能每个人都吃一个煮鸡蛋，而共同分享更不允许，母亲说生日蛋就是一个人的命，只有圆圆满满，一生才能顺顺当当。因此，每个人的生日蛋都是背着其他人偷偷摸摸吃的。我是长子，我的生日，弟弟妹妹往往比我还记得清楚，当母亲悄悄把煮鸡蛋塞进我手里，示意我躲到屋后竹林中吃，我前脚刚溜出门，弟弟妹妹后脚就尾随而至。母亲赶忙挡在他们前面，连哄带骗地将他们往屋里拉。大一点的虽不情愿但不吭声，小一点的就哭哭啼啼叫嚷：“我也要吃鸡蛋！我也要吃鸡蛋！”此时，手中握着的鸡蛋犹如烫手山芋，让我不知所措，急得母亲大声吼叫：“赶快吃！赶快吃！”含着眼泪吃鸡蛋，越想快点吞下去，哽噎得越是难以下咽，至今回想起来，喉咙仍感到隐隐作痛。

大学期间，先后应邀参加过几个同学的生日后，思忖着自己过生日也该回请他们，毕竟“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想法虽好，现实却尴尬，囊中羞涩，不容任性。如果咬牙请一次客，一个月的生活费就没有了，锅儿吊起当钟敲，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向家里求援，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明显感到底气不足，父母除了供我上大学、二弟上中专外，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上小学和初中，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拆东墙补西墙弄得手忙脚乱，哪里还有闲钱让我请客面子。在面子与里子孰轻孰重的反复较量中，最终还是虚荣心占了上风，硬着头皮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可左等右盼，临到生日那天，日思夜想的汇款单始终未见踪影。当天晚上，不仅没有过生日，而且连学生食堂也没敢去，担心有同学祝我生日快乐或开玩笑让我请客。独自呆坐在校园的某个僻静处，眼中噙满泪水，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为没有奉行“礼尚往来”而歉疚，一方面为父亲的回信深感愧疚：“……你的生日，正是你老娘的受难日，在这个重要的日子，更应该感念的是她的孕育之苦、养育之恩……”

第一份工作，是被分配到一家三线厂子弟校教书。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囿于一地，经年累月，难免苦闷落寞。于是，朋友同事之间的聚会喝酒，便成了许多外来学生排解忧伤、自寻欢乐的方式。因与同室好友生日相差只有几天，便有些同事朋友鼓动在周末一起庆生，见我有些迟疑，有性急者嚷道：“过生日只不过是找个聚会喝酒的由头，其实就是打平伙，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话已至此，再固执己见，就扫大伙的情面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这么一个打平伙的聚餐，却触动了有些人敏感的神经：这些年轻人太不像话了，公然地吃吃喝喝拉帮结派，长此下去，校风都被他们搞坏了！更有甚者，因参与聚会的几个朋友同事在厂闭路电视台为我们点歌庆生，落款为“四君子”，便被不怀好意者穿凿附会，上纲上线：“他们是君子，难道我们就是小人啦？太嚣张！太狂妄！”如此拙劣的言论，居然有校领导就信了，大会小会点名敲打。唉！一个平平常常的生日，竟然引发如此大的风波，你说揪心不揪心？

年满60岁，倘若岳母健在，肯定又要抱怨甚至怒斥我不信守诺言，因为我仍然婉拒没有大摆生日宴，只是小范围地请了附近的亲友聚餐，而且由头也不是庆生，而是庆贺自此以后，我从一个缴社保的人，摇身一变成了领社保的人。这个日子很特殊、很重要，值得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眼镜科技杂志)



能懂的诗

## 石门村的鸡窝地

□李光辉

石门村的人均耕地面积  
不足一亩三分  
村民分得的地块  
往往只有鸡窝般大小  
而且错落在  
喀斯特的溶岩中

每天清晨  
石门村的人们  
伴随着一声声鸡鸣  
从梦里苏醒过来  
在离鸡窝地不远的灶屋  
升起一缕缕炊烟

然后他们迎着晨曦  
上坡干活去了  
除去杂乱的野草  
翻开瘠薄的土壤  
就像鸡们一样  
在土地里刨食

如果感到累了  
就在地头歇息  
俨然一只母鸡  
在窝里待着  
慢慢地生出了  
鸡蛋似的红薯和土豆

很多年了  
他们就这样生产着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  
因为他们始终相信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鸡窝  
(作者系重庆新诗  
学会会员)

